《汉宫秋》本事之变异与创新

——从唐宋诗到元杂剧的演化

张高评

[摘 要] 文学作品有因有革、有拟有改、有述有作，有模仿更有创造。竞争超胜之道，往往对于前人文本之空白处、未定点、叙事情节之大跨度处，笔墨之外的情韵处，尝试作纵深开凿，横向发挥，于是可以挥洒遗妍，开发创意。《汉宫秋》曲文之创作，即有如是之优长。就本事之变异与创新言，相较于唐宋诗，《汉宫秋》中，叙事之视点，由聚焦王昭君转变为特写汉元帝；空间之场景，自塞外穹庐挪移为汉宫掖庭；汉胡之形势，由汉强胡弱转为汉弱胡强；琵琶之代言，从传写怨恨变为排遣孤闷；史传之元帝诚信不欺，杂剧之君王风流多情。史传诗文之王昭君，出塞和亲；马致远之《汉宫秋》，投江殉节。就王昭君故事形成之五大基型言，长于转化与创新如此，《汉宫秋》遂蔚为元杂剧压卷之作。"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此固一切文学生存发展之通则，此中有之。

[关键词] 《汉宫秋》 昭君故事 变异 创新 唐宋诗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890（2011）03－020－13

一、昭君故事之原型与唐宋诗题咏昭君

（一）王昭君和亲故事的五个系统

昭君和亲的故事，载存于班固（32－92）《汉书》者，最为原始滥觞。[①]其二，则《乐府诗集》所载蔡邕（133－192）《琴操》，[②]叙述另类，情节独特。其三，东晋石崇（249－300）《王明君辞并序》，[③]误读历史，移花接木，将公主琵琶转移为昭君琵琶。其四，则号称葛洪（283－363）所撰《西京杂记》，[④]踵事增华，秀异可观。其五，则刘宋范晔（398－446）《后汉书》所叙，[⑤]情节完整，将昭君美丽形象具体化、生动化。

就近代发现之敦煌遗书而言，涉及王昭君之文献有四，[⑥]有关王昭君和亲故事及人物形象，较前文所述五个系统之空白与未定，又有所添加、滋长，尤其是《王昭君变文》。唯敦煌写本抄定后，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间，皆封存于敦

[作者简介] 张高评（1949－），男，台湾台东人，文学博士，成功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 台南，70455）

①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版，卷 9，第 297 页；卷 94 下，第 3803－3808 页。

②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台北：里仁书局 1984 年版，卷 59，第 853－854 页。

③ 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台北：世界书局 1978 年版，《全晋诗》卷 4，第 401－402 页。

④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 2，《王嫱》，（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卷 66，第 3090－3091 页。

⑤ （刘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集解》，台北：艺文印书馆 1958 年版，卷 89，第 1057－1058 页。

⑥ 伯 2553《王昭君变文》，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成都：巴蜀书社 1990 年版，第 191－226 页。伯 2553、伯 2673、伯 4944 三个写本，见柴剑虹《敦煌唐人诗人选集残卷（伯 2555）补录》，《文学遗产》1983 年第 4 期，第 146 页。伯 2748《王昭君怨诸词人连句》，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版，上册，第 76－77 页。斯 0555《昭君怨》，潘重规《补全唐诗新校》，《华冈文科学报》1981 年第 13 期，第 188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煌石窟中，可以存而不论。后代述说昭君故事，状写昭君形象，大抵多就以上五个系统作粉本，进行生发、补充、增订、创作。

（二）唐宋诗王昭君形象之塑造与形成

王昭君之人物形象，除上述五大系统基型外，唐宋诗歌颇开发其中之遗妍。相较于唐诗，宋诗多体现异化、新化、深化、广化之趋向，正足以论定其传承与开拓之价值。

就昭君在汉宫之遭遇而言，唐宋诗共同关注造成不幸之缘因；重轻之间，依序为容华误身、图画失真、以及拒赂黄金，而且后二者互为因果。唐代诗人喜好就后二者叙写，对“容华误身”较少渲染刻画。宋代诗人则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咏叹昭君冷落汉宫及悲怨和亲的不幸，偏爱从“容华误身”、红颜薄命去发挥。

昭君出塞之悲愁，与含恨异域之不幸，为唐宋诗齐心关怀，极力渲染之两大主题。自古以来，中国外患多来自北方，由于中原文化的本位及优越感，视自身为“我者”，为中心；遂矮化丑化夷狄之邦，看作“其心必异”的“他者”，甚至目为“边陲”，非我族类。此种文化意识投射在文学，于是昭君不过为一后宫女子而已，唐宋诗人竟共伤其去国，共怜其出塞、同情其憔悴异域，共哀其含恨青冢，其中隐然有“我者”与“他者”之意识在。①

就昭君出塞历程而言，唐宋诗人多特写其去国之泪，及出塞之悲。宋代《春秋》学昌盛，“正统论”研讨热烈，故北宋诗人所咏昭君之悲情不幸，较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人经营意象，处理场景，除传承唐人“化景物为情思”之手法外，又多夹叙夹议，寓物说理，借事明义。唐诗议论，多“带情韵以行”，故较婉约含蓄。宋人喜好翻案，以期推陈出新，于咏昭君诗可见。

由于琵琶哀怨之曲调，足以愁塞月、恨边云、敛人眉、诉衷情，故唐宋诗人咏昭君出塞和亲之不幸，往往藉琵琶书写心声。自石崇提示开端，至杜甫、李商隐踵事增华，至宋人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秦观诸家之缘饰附会，孳乳展延，悲怨不幸之形象乃大抵完成，诚如王楙《野客丛书》所云。② 于是移花接木，李代桃僵，公主琵琶与昭君琵琶乃混同为一。王安石《明妃曲》、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叙写昭君和亲故事，特写琵琶，跃升为主体焦点，将生平之怨恨与不幸，凭借琵琶旋律表出。其它两宋诗人咏昭君诗，也都有类似之遗妍开发。

对于王昭君“丰容靓饰，光照汉宫，顾景徘徊，竦动左右”的秀色妍姿，令汉元帝惊艳且“不自持”的美貌，究竟是祸还是福？北宋以前诗人多持两端：既说其“荣华自误”，又称其自信自恃。南宋诗人歌咏昭君美丽，或翻转其说，更多从倾城倾国、美人祸水各方面去论述；更有称其和戎靖边，功勋不让卫霍者，创造出许多翻案奇作。这种推陈出新、意外自得的翻案手法，晚唐人偶用，北宋诗人大开风气，南宋踵事增华，使得昭君和亲有了新颖独特、“别生眼目”的诠释角度。翻案诗至南宋而精益求精，形成宋诗特色之一，昭君诗中多用此法。③

昭君饮恨异域，独留青冢，唐宋诗人不约而同，共叹其不幸。唐人所咏昭君身处异域之憾恨，尤其侧重叙写故国之怀思。宋人所作，注重迭映与对比，关注梦归汉家及情托南雁。其它，有立意因袭，而内容更加深化广化者；亦有生发议论，独具只眼者；更有会通诸长，化成新作者，多有可观。

北宋诗人叙写“青冢”，如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二及《明妃曲》，亦以悲怨为主，知南宋诗人之悲怨，继承有自，这是对传统的“证同”，也是南宋诗人咏昭君和亲的第一种评价。南宋诗人咏昭君“死留青冢”，另有表现乐天知命、无怨无悔者，这是第二种评价。又有一类诗，扬弃悲哀，标榜立功不朽，则是第三种评价。南宋诗人咏史，以昭君和亲，立功不朽为说，亦足以告慰其平生。此种人生观感，北宋诗人尚未发明，何况唐代诗

①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8、65－83 页。

② （宋）王楙《野客丛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52 册，卷 10，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632 页。

③ 张高评《创意造语与宋诗特色》，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2008 年版，第 389－443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人？宋诗注重反思内省，尚意贵理，此乃宋型文化之体现，南宋昭君诗可见一斑。

汉魏六朝之审美意识，大体是“以悲怨为美”①。唐代继承此一传统，观物论人遂多体现悲情意识。北宋诗与两宋词传承之，遂多以悲怨为美；至北宋末到南宋，朝廷崇儒右文，儒学致力自持自适，才化悲怨为乐观旷达。两宋咏叹昭君之诗歌，一方面传承唐诗悲怨哀恨之审美意识，一方面于叙述视角、意象经营，以及创意造语，多有显著之变异与拓展。

二、《汉宫秋》本事之转化与生新

王昭君和亲匈奴，发生在汉元帝竟宁元年（B. C. 33）。其后历代文人吟咏不绝，唐代公主和亲踵其故事，宋代四大和议神似而貌不似，都触发或多或少之题咏。表现于诗歌者，在蒙元以前，题咏昭君之诗已多达 242 首以上。王昭君故事流衍有五大基型，姑且作为《汉宫秋》研究之对照组。

就昭君和亲之本事而言，历代文人演述之，各有不同的偏好与侧重。汉胡之强弱、华夷之分际、公私之交战、雅俗之接受、审美之流变，为其中之影响因素。唐宋诗人对王昭君之评价，大抵多从五个层面进行诠释：或藉琵琶以写怨，或评画图之妍媸，或说红颜之祸福，或论和亲之是非，或述远嫁之哀乐。其中，和亲之是非，讨论最为热络，至清代题咏依然最多。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于是元人演述昭君故事，不得不追求转化与创新。

元代马致远（1250？－1323？）《汉宫秋》，作为叙事诗剧，号称元曲压卷之作，以叙事为主，不以品题人物、论断是非为务，于是有关昭君出塞和亲之故事，如画图之妍媸、红颜之祸福、和亲之是非、远嫁之哀乐等各种诠释解读，因时移势迁，大多删略不言。只有画图之点破、红颜之祸害，顺带略及而已，未尝作引申发挥。文学作品有因有革、有拟有改、有述有作，有模仿更有创造。竞争超胜之道，往往对于前人文本之空白处、未定点、叙事情节之大跨度处，笔墨之外的情韵处，尝试作纵深开凿，横向发挥。如此将可以挥洒遗妍，开发创意。《汉宫秋》曲文之创作，即有如是之优长。

有关王昭君故事之研究，历来论著不少，大多为单篇论文。如张寿林《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梁容若《关于王昭君之历史与文学》、王季思《从＜昭君怨＞到＜汉宫秋＞——王昭君的悲剧形象》；② 此 1980 年以前之成果。近十五年之成果，则如陈鹏翔《主题学理论与历史证据——以王昭君传说为例》，③ 从主题学视角作宏观论述，值得参考。曾永义《民族故事五·王昭君故事》，④ 从原型、孳乳、演化诸发展规律，作为诠释进路。张高评《王昭君形象之流变与唐宋诗之异同——北宋诗之传承与开拓》，⑤ 探讨汉宫秋、出塞泪、异域恨三大主题类型，以对比出宋诗之特色。其它，尚有大陆期刊论文若干篇，新意不多。⑥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汉宫秋杂剧＞的文学性》一文，阐述《汉宫秋》藉风流天子表现人

① 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6，《全汉文》卷 42，台北：书林出版公司 1990 年版，第 946－951 页。

② 张寿林《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下册，台北：明文书局 1985 年版，第 609－648 页；梁容若《关于王昭君之历史与文学》，《大陆杂志》1950 年第 9 期，第 5－8 页；王季思《从＜昭君怨＞到＜汉宫秋＞——王昭君的悲剧形象》，《王季思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26－541 页。

③ 陈鹏翔《主题学理论与实践：抽象与想象力的衍化》，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 2001 年版，第 257－296 页。

④ 曾永义《俗文学概论》，台北：三民书局 2003 年版，第 495－508 页。

⑤ 衣若芬、刘苑如主编《世变与创化：汉唐、唐宋转换期之文艺现象》，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 2000 年版，第 487－526 页。

⑥ 如胡小成《古代昭君题材的历史演变》，《求是学刊》2006 年第 2 期，第 115－120 页；王宝琴《昭君形象的类型及其文化类涵》，《西北师大学报》2007 年第 4 期，第 73－78 页；王作良《＜琴操＞与昭君题材的文学化进程》，《宁夏大学学报》2007 年第 4 期，第 37－42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间爱情，以为此乃动人心弦处，亦即文学价值所在。[①] 此一观点，颇有参考意义。

至于专著，所见有两本：其一，巴尔特编选《昭君论文选》，为相关论文之汇编；[②] 其二，为张文德《王昭君故事的传承与嬗变》，为作者之博士论文，就昭君故事之形成，唐宋诗歌、散文、传奇、变文之传承发展，明清杂剧小说之生成与嬗变，作宏观流变之梳理，自有其参考价值。[③] 本文借镜前人论著成果，"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④]笔者参考昭君故事之五大系统，对照唐宋诗有关王昭君形象之塑造，考察《汉宫秋》所措意者，得出下列六大项目，其中自有许多异人所同之成果。论证如下：

（一）视点转移：从昭君转化为元帝

王昭君故事之五大系统，以及敦煌变文、唐、宋、金、元诗词之所述，六朝以来士人演述昭君故事，大多以王昭君为主体，进行叙事、题咏。[⑤] 相形之下，汉元帝只是陪衬之配角，在唐宋昭君之题咏中，受关注之份量，甚至不如画工毛延寿，情节甚少，着墨不多。

唐人题咏昭君故事，多以王昭君之不幸为焦点，顺带略及画工毛延寿，而轻点汉元帝。宋金诗人题咏，则广泛讨论造成王昭君不幸之缘因，或以为王昭君"自倚绝世姿，不赂毛延寿"；或指斥毛延寿"画工私好恶，丹青能乱真"；或评议汉元帝"君王先错计，耳目寄他人"。汉元帝于王昭君故事流传中，首先受到关注，叙写聚焦，在宋金人题咏中，大抵多出于讽谕得失，兴寄治乱。如欧阳修《再和明妃曲》："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文同《王昭君四首》之二"谁知金屋宠，只是信丹青"；孙嵩《明妃引》："可怜君王目，但寄丹青手"；曹勋《昭君怨》四首之二"当时岂止毛延寿，对面欺君事更多"；又，《王昭君》："君王视听能无壅，延寿何知敢妄陈"；徐钧《王昭君》亦云"自是君王先错计，爱将耳目寄他人"；[⑥] 由此观之，汉元帝无疑是一位视听被蒙蔽，无知而妄信，识人不明，大权旁落的一位昏君。帝王形象如此，治国无方如此，遂连累昭君和亲匈奴。揆诸《汉书·元帝纪》，这不过是藉题发挥，比兴寄托而已。历史事实显示，汉元帝并不昏庸。昭君故事流传，叙事视点真正聚焦在汉元帝，得期待马致远《汉宫秋》。

马致远《汉宫秋》发挥创造性思维中之求异思维（divergent thinking），致力变通、探索、独创，[⑦] 于是反客为主，将《汉宫秋》变为末本戏，以汉元帝为主角。杂剧各折情节，都以正末元帝为叙事视点，唱出所见、所思、所闻、所感；王昭君于《汉宫秋》虽为正旦，却已退居配角，只有科白，并无唱词。如此安排，已跳脱昭君出塞和亲之历史使命，而凸显出元帝对昭君的爱情和迷恋，所谓"愁花病酒"之风流；以及贵为天子，却"一身不自由"之苦楚。亡国之君的荒唐、软弱和无奈，已具体而微勾勒。其中自有许多兴寄与讽谕，意在言外。《汉宫秋》剧中，汉元帝虽然无能，又身陷困境，对昭君之爱情却一往情深，始终不渝。爱情真挚如此，所以能感动人心，成为文学瑰宝。

据锺嗣成《录鬼簿》记载，元代叙写昭君故事之杂剧，共有四本：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马致远《汉宫秋》、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除《汉宫秋》外，其它三本皆已

---

① ［日］吉川幸次郎《〈汉宫秋杂剧〉的文学性》，郑清茂译，《台湾戏专学刊》2003 年第 7 期，第 56－58 页。

② 巴尔特编选《昭君论文选》，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 张文德《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8 年版。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台北：华世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38 页。

⑤ 可永雪、余国钦编纂《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63、231－233、253－293 页。

⑥ 张高评《〈明妃曲〉之唱和与创造性思维：以宋诗题咏画图妍媸、红颜祸福为例》，"中国诗歌传统与文本研究"国际论坛论文（2010 年 12 月），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第 12－18 页。

⑦ 参考张永声主编《思维方法大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9－50；田运主编《思维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62－263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亡佚。[①] 就剧名推想，前两种为末本戏，后二者为旦本戏。关汉卿（1225？－1300？）时代，约早于马致远25年。所以学界推测：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对马致远《汉宫秋》创作必有影响。[②] 元杂剧另一名家白朴（1226－1306），约长马致远24岁，所作《梧桐雨》，铺述唐明皇杨贵妃间悲欢离合之爱情故事。论者已将《汉宫秋》、《梧桐雨》二剧之相关相同内容，逐一比对，发现有若干巧合，推测两剧必然存在某种传承关系。白朴是否影响马致远？不无可能。[③]

总之，历代演述昭君故事，不以王昭君为叙事焦点，改由汉元帝为叙事主角，此种反客为主之视点转移，马致远《汉宫秋》纵然不是创始，然集成光大之功，堪作叙事文学中，经典转移之优良示范。

（二）空间转变：自塞外挪移为汉宫

王昭君故事之情节，尤其是汉宫与塞外的若干场景，《汉书》的《元帝纪》与《匈奴传》、《琴操》、石崇《王明君辞》、《西京杂记》、《后汉书·南匈奴传》，都呈现许多“空白”和“未定性”，期待后人之填充和补强。宋人于此，颇致力创意之研发。譬如昭君出塞前夕，衡情度理，应有一场“临辞大会”。这一送行仪式，上述文献都未有记载，宋诗则绘声绘影，呈现当时场面。

诗人对于空白的填充，未定性的具体化，凸显诗人探察究竟，避同趋异，裨补阙漏的创作冲动，增强了昭君文学形象的鲜活性和丰富性。宋代诗人多用七言古诗长篇题咏昭君和亲故事，其中塑造形象，增补场景，暗合格式塔（完形）心理学所谓“接受者对于未定性与意义空白的填补，具有心理追求的内在需要”；进行空白与未定性的完形，方可产生审美的愉悦。[④]

王昭君和亲之故事，在五大系统基型之后，六朝、唐、宋诗歌、变文，涉及之相关场景，除掖庭孤闷、临辞大会以外，出塞、和亲、靖边，乃至于青冢流芳，空间场景多在匈奴与塞外。昭君和亲本事，顾名思义、惯性思维，舞台安排想当然尔在异族北地，塞外胡天。宋人作诗，注重创意思维，常就五大基型作“遗妍之开发”，其中或就掖庭孤闷作渲染，或就临辞大会作铺写，空间多定格于汉宫，诗思措词颇富于创造发明。尤其前者，堪作马致远《汉宫秋》之孤明先发。

如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⑤] 增添王昭君和亲之临辞场景，补充昭君塞外生活之剪影。刘敞《王昭君》，[⑥] 设身处地，妆点临辞场面，此诗有补充之功。薛季宣《明妃曲》，[⑦] 亦刻划王昭君临辞之场景，填补了昭君故事许多空白与未定。王洋《明妃曲》，[⑧] 分咏汉宫春怨、辞别汉宫，以及出塞苦辛三个场景，详尽周赅，为诗篇少见。除此之外，昭君和亲场景，则大多如邢居实《明妃引》所叙，[⑨] 极力铺写胡天黄沙、胡笳南雁，营造塞外之场景。洪咨夔《昭君行》所述，[⑩] 则特写昭君和亲之喜乐场景，营造为歌舞欢笑之氛围。上述场景，或安排于汉宫，或设定为塞外，观照宋人所作153首昭君题咏，场景之铺陈凸显，可谓绝无仅有。其余所涉空间，无论远嫁、出塞、和亲、靖边、身后，都不离匈奴塞外之场景。即使敦煌写本《王昭君变文》，叙事场景亦安排于胡天穹庐。

《汉宫秋》杂剧之新异处，在挪移塞外之空间，转变为汉宫之场景。如此，颇有利于以汉文帝为正末、为视角，以观照爱恋昭君、单于求亲、灞桥伤别、孤雁幽梦、讽谕将相诸情节。叙事视

① 钟嗣成、贾仲明编，浦汉明校《录鬼簿正续编》，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版，卷上，第55、96、99页。

② 张文德《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第138页。

③ 张文德《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第148－157页。案：俞大纲《戏剧纵横谈》中《梧桐雨与汉宫秋》一文，早已谈及。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版。

④ 金元浦《空白与未定性：审美感性生成的中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4期，第74页。

⑤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卷499，第6044页。

⑥ 《全宋诗》卷467，刘敞《王昭君》，第5667页。

⑦ 《全宋诗》卷2475，薛季宣《明妃曲》，第28696－28697页；四库本《浪语集》卷12，第1159册，第232页。

⑧ 《全宋诗》卷1687，王洋《明妃曲》，第18937页。

⑨ 《全宋诗》卷1302，邢居实《明妃引》，第14810页。

⑩ 《全宋诗》卷2890，洪咨夔《昭君行》，第34473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角，是一部作品、一个文本，观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马致远《汉宫秋》以正末为主角，以汉元帝现身说唱推动情节发展，即以汉元帝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为视角，一以贯之。单一的限知视角，固然便于集中聚焦抒写，然同时留存若干模糊和虚空，可以提供读者联想余地，开发空间。①

（三）帝王重塑：由天子重信转为君王多情

有关汉元帝之形象，无论小说或正史，都一致认为是“重信于外国”、“难于失信”的君王。《西京杂记》谓“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后汉书·南匈奴传》亦称“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换言之，在国际诚信与美人赏爱取舍上，汉元帝很无奈的割舍赏爱，而成全诚信。一小说，一史传，都是这样认定的。

宋人崇德尚格，故题咏昭君和亲，亦标榜诚信无欺。文同《王昭君四首》之三云：“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② 王洋《明妃曲》曰：“当日君王喜且惊，欲留失信去关情。”亦有转化诚信为昭君之深体君心者，如徐得之《明妃曲》称：“妾生岂愿为胡妇，失信宁当累明主”③ 王炎《明妃曲》亦谓：“约言已定不可悔，毡车万里随单于。”④ 诚如无名氏《王昭君上汉元帝书》所云：“中华之所以贵于外邦者，以其有信耳，陛下岂以一女子失信于呼韩邪哉?”⑤ 由此观之，汉元帝之形象，一般而言，是重然诺，守诚信，能为江山国家大局设想的君王。

汉元帝讲诚信，以江山社稷为重的形象，转化为体贴多情，甚至风流天子，是逐渐演变的。首先，汉元帝和王昭君第一次见面，应当是在单于来朝求婿，临辞大会元帝召见昭君的公开场合。《西京杂记》叙写汉元帝召见王昭君，发现昭君“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后，内在反应是“帝悔之”，追悔莫及。《后汉书·南匈奴传》亦摹写临辞大会上，“昭君丰容靓饰，光照汉宫，顾景徘徊，竦动左右”；能令“帝见大惊，意欲留之”。汉元帝贵为天子，后宫佳丽三千，理当“曾经沧海难为水”，今日一见昭君，竟然是“除却巫山不是云”。《西京杂记》所云“帝悔之”，《后汉书》所称“帝见大惊”，已隐含君王之动心与多情，留给后世文人许多想象空间，纷纷针对上述空白、未定处，进行创造性填补。其后，敦煌《王昭君变文》，叙单于王之怜香惜玉，体贴入微，亦隐然有多情君王之雏形。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之一云：“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称：“明妃挥泪辞汉主，汉主伤心知奈何?”君王也略有动情之倾向。宋代崇儒右文，理学道学昌盛，对于天理公义与人欲私情之论述，趋向不以私情妨害公义，⑥ 因此，诗文小说中汉元帝和王昭君在“私领域”方面，不可能有任何发展。甚至于从春秋时代《左传》所载“甚美必有甚恶”之审美观，一直紧扣在宋代文学的论述上，多以为红颜胜人，将招来祸患，如陈宓《和徐绍奕昭君图》：“世人重色多欷歔，不思婉娈同戈殳”；袁燮《昭君祠》：“从来败德由女美，褒姒骊姬及西子”；郑清之《偶记赋王昭君漫录之》：“伐国曾闻用女戎，忍留妖丽汉宫中?”萧澥《昭君词》：“会得吴宫西子事，汉家此策未全疏”。⑦ 由此观之，汉元帝与王昭君之恋情，在宋型文化之氛围下，不可能有突破性之发展。王昭君故事情节之突破，正有待马致远《汉宫秋》之曲文。

---

① 杨　义《中国叙事学》，嘉义：南华管理学院 1998 年版，第 251 – 275 页。

② 文　同《王昭君四首》，《全宋诗》卷 432，第 5304 页。

③ 徐得之《明妃曲》，《全宋诗》卷 2334，第 26837 页。

④ 王　炎《明妃曲》，《全宋诗》卷 2559，第 29688 页。

⑤ 可永雪等《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第 434 页。

⑥ ［日］沟口雄三《中国公私概念的发展》，汪婉译，《国外社会科学》1998 年 2 期，第 61 页。又，沟口雄三：《“公”的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区别》，从思想史看来，主张肯定“私”的，仅有六朝，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国的三次政治大动荡时期。冉毅译，《船山学刊》1999 年第 2 期，第 48 – 52 页。

⑦ 陈　宓《和徐绍奕昭君图》，《全宋诗》卷 2852，第 34006 页。袁　燮《昭君祠》，《全宋诗》卷 2646，第 31000 页。郑清之《偶记赋王昭君漫录之》，《全宋诗》卷 2898，第 34621 页。萧　澥《昭君词》，《全宋诗》卷 3254，第 38822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王昭君和亲故事之流传，至马致远《汉宫秋》，[①] 状写汉元帝之痴情与离恨，俨然塑就风流帝王之形象，始令读者耳目一新。首先，在第一折，汉元帝一上场所唱《仙吕点绛唇》，就给读者观众一个风流无赖的形象，所谓“车辗残花，玉人月下吹箫罢；未遇宫娃，是几度添白发！”以象征手法，形塑一位天生情种，风流帝王，颇有叙事之悬念效果。第二折叙述元帝自见了王昭君，如痴如醉，久不临朝，称“近新来染得些症候”，其中“一半儿愁花病酒”。当尚书令五鹿充宗建请“昭君娘娘和番”时，元帝气急败坏，悲愤莫名，只为红颜“文武商量，可退番兵”，只为了“免教昭君和番”。无奈满朝文武庸懦无能，束手无策，元帝责怪他们“大抵是欺娘娘软善！”甚至意气用事地说“久已后也不用文武，只凭佳人平定天下便了！”固然句句讽刺将相无能，家国不保。[②] 而一心一意袒护美人，以至于感情用事。是置昭君之去留，高胜于汉匈和平之上。元帝之痴情多情，可以想见。

《汉宫秋》第一折曲文，在塑造汉元帝成为风流天子，多情皇帝方面，十分细腻精彩，堪称元杂剧中描情写恨之当行本色。梁廷枏《曲话》品赏《汉宫秋》，以为“写景写情，当行本色”；王季烈《曲谈》亦称扬之，以为“词旨妍丽，与实甫《西厢记》相颉颃。”试翻阅《汉宫秋》曲文，妍词丽句多表现于描情写恨、勾勒姿容、灞桥伤别、孤雁幽梦四大部分。尤其描情写恨，最见当行本色，如《混江龙》曲文，设身处地，想象掖庭宫女盼望宠幸，疑恨交加之情形。待王昭君藉琵琶之“嗟呀”写出孤闷之心声，内官传令快报接驾，汉元帝却言“不要”“莫便要忙传圣旨”，原因是“怕乍恩”引发昭君担惊受怕，无端吹皱一池春水，何等怜香惜玉，何等体贴人意。当王昭君迎接圣驾后，汉元帝唱《油葫芦》曲文，首先对“不曾来往乍行踏”表示请罪，请求宽恕；以帝王之尊，而降尊纡贵如此，诚属难得。于是摇身一变，元帝成为多情天子：亲身慰问致歉，想填还泪帕、温和露袜；承诺宠幸艳姿，保证喜信频传。元帝受琴挑而回响如此，反向之创造性思维，令人激赏。

又如《赚煞》曲文，叙写汉元帝期盼明日醉卧昭阳殿，王昭君云：妾身“怎敢望？”元帝调侃逗弄，轻浮无赖，活画出风流帝王口脗：承诺明朝再踏长门，吩咐昭君“你是必悄声儿接驾，我则怕六宫人攀例拨琵琶！”词甚狎昵，令人忍俊不住。犹李后主《菩萨蛮》“今朝好向郎边去”，“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所云，[③] 异曲同工：艳情同，轻薄风流亦不遑多让。词虽近似《香奁》，然如《离骚》好色而不淫，生动塑造出庶民心目中的风流帝王来。

《汉宫秋》第三折，叙述明妃出塞，灞桥伤别。马致远摹写离思别恨，沁人心脾，绝妙好辞，更是所在多有。前折之风流帝王，顿成了痴情天子，如《双调新水令》叙灞桥送别，虽则云旧恩如金勒之短，新恨似玉鞭之长，然本折曲文写作手法却速写新恨，细描旧恩；叙旧恩之悱恻缠绵，正足以烘托新恨之滋长无限。《步步娇》曲文，作异乎寻常之奇思妙想：元帝要求“一曲阳关休轻放”，“与我半句儿俄延着唱”，就算“劣了宫商”，荒腔走板也无妨，只为了“待尊前捱些时光”，期盼时间停格，延缓别离时光。《落梅风》所谓“可怜俺别离重，你好是归去的忙！”于是“慢慢的”，成为本曲文之时间节奏，哀伤而沉重是其基调。汉元帝虽然轻薄风流，对昭君却是一往情深。《殿前欢》由舞衣裳之留下，唤起了旧时情怀：在人去楼空之后，元帝怕“宫车再过青苔巷”，怕“猛到椒房”，怕睹物思人，怕想起“菱花镜里妆，风流相”。由此看来，这对露水鸳鸯，旧恩为时虽极短暂，情丝却极绵绵悠长。元帝唱：“看今日昭君出塞，几时似苏武还乡？”别离在即

① 顾肇仓（学诵）：《元人杂剧选注》，台北：世界书局 1968 年版。

② 宋代政策重文轻武，守内虚外，于是将帅愚懦，出戍则亡，遇敌则溃。宋初柳开（947－1000）《代王昭君谢汉帝疏》所云：“以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戈、靖边戍，是大臣之事也。食陛下之重禄，居陛下之崇位者，曰相，宜为陛下谋之；曰将，宜为陛下伐之。”讽刺将相无能，堪作代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成都：巴蜀书社 1989 年版，卷 116，第 575－576 页。

③ 王兆鹏主编《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46－549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已令人失望肠断，仍痴心盼望他日相会有期，其多情痴情可见一斑。

《汉宫秋》虽为表演艺术，面向普罗观众与听众，语言固然以通俗风趣为主。但其中却有极雕饰、极工巧，用笔极典丽，思致极缠绵悱恻处。综观全剧，莫过于《梅花酒》、《收江南》曲文。离情别思之铺写，写得回肠荡气如此，堪称极笔。先营造“迥野悲凉”之场景，以草添黄、兔迎霜点染萧瑟场景，接写犬、人、马、车之装束，为“打猎起围场”，迎送昭君出塞作排场，所谓前驱、仪仗，是将为单于阏氏应有之礼数，借景写情，细腻入微。离愁别绪之氛围既已形成，继而分写昭君辞汉主、入穷荒，元帝上河梁、返咸阳，劳燕飞分，各奔西东。恰如前云：“本是对金殿鸳鸯，分飞翼，怎承望!”自“返咸阳”以下十六句，以辘轳顶真手法，写睹物思人，因景生情，所谓黯然销魂之离情别思，多经由绘声绘影之摹写，而达到兴会淋漓之呈现。尤其《收江南》曲文，以“不思量，除是铁心肠! 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双重否定，层波叠澜，翻腾有致。用笔典丽如此，堪称范式。元明戏曲论著，都以东篱造诣为元曲第一，良有以也。

昭君出塞和番，元帝灞桥伤别后，返咸阳、近椒房，而思量泪滴，而无限怀想。马致远刻划元帝痴情恋情，极执着，极绸缪。如《收江南》曲文，并用翻叠层递之法，以渲染别后相思之情之难了，伤心肠断之不已。昭君人已入穷荒，而美人图仍夜挂昭阳，元帝犹真心供养，仍爱不忍释。观图引发记忆，睹物思念昭君，真是情何以堪：“高烧银烛照红妆”，暗用苏轼《海棠》绝句之意，喻念兹在兹，何时忘之! 昭君既辞汉宫，已人去楼空，故元帝“想娘娘不见半分形”。幸好“美人图今夜挂昭阳”，姑且“留下这影影”，“未死之时，在生之日”，犹然一往情深的“恭敬”。马致远藉物写人，对昭君美人图“这个影影”，尚且如此“供养”、“恭敬”；那么爱屋及乌，元帝之情深意重，可以想见。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以为《汉宫秋》之动人心弦、文学价值，在于“利用天子这种特殊人物的困境与悲哀，藉以表现爱情的本质，原来人人相同，并不因地位或身份高低而有所差异，从而肯定了人间爱情存在的必然性。”① 以天子之风流多情，证实了人性、爱情确有共同而普遍之面向。马致远《汉宫秋》杂剧，是通过变异与创新的艺术手段，促成观众审美感知的变异，才铸造上述的效果的。戏剧家余秋雨曾就观众审美感知的变异，来看艺术的目的取向：“有人希望通过变异，给观众带来一些陌生感和阻隔感，使他们兀然惊起，获得在平时熟识无睹的人生要旨。”② 马致远《汉宫秋》将史传诚信不欺之帝王，变异为风流多情之天子，确有上述成效。

(四) 历史误读：汉强胡弱变为汉弱胡强

汉朝初立，匈奴国力强盛，遂南下入侵中原。高祖六年（B. C. 200），刘邦率32万大军迎击匈奴，为匈奴40万大军围困于白登七昼夜，不得食。卒用陈平奇计，得以解围。③ 于是乎而有娄敬和亲之议，历经吕后、惠帝、文帝、景帝，前后有十位公主和亲匈奴，和亲成为屈辱、求和、纳贡的汉家故事。西汉初期胡强汉弱，形势大抵如此。

迨汉武帝继位，亟思雪耻复仇，乃先后派遣卫青、霍去病、李广利、苏建、程不识等名将，九次征讨匈奴。武帝在位54年，征讨匈奴44年，前后期战争虽则汉胡各有胜负，然整体上汉朝为得不偿失，在生命财产方面付出沉重的代价，详见《史记》之《平准书》、《高祖本纪》、《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④ 不过，从此西域诸国震恐，纷纷遣使来献，谋求和亲。长安前往西域之路畅通，汉王朝取得西域之掌控权。于是一变为汉强胡弱，形势遂成大逆转。

汉宣帝甘露年间（B. C. 53 – 50），匈奴单于内乱分立，汉将陈汤、甘延寿斩杀郅支单于。

① [日] 吉川幸次郎《<汉宫秋杂剧>的文学性》，第1 – 31页。

② 余秋雨《观众心理学》，台北：天下文化2006年版，第122 – 130页。

③ 司马迁著，[日] 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1996年版，卷56，裴骃《史记集解》引桓谭《新论》，第814页。

④ 张大可《史记文献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 – 332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呼韩邪单于势单力孤，恐汉攻击，因此心怀畏惧而前来长安朝觐，情愿婿汉自亲。此一汉强胡弱之形势，一直持续到汉元帝之世（B. C. 49 – 33），延续到昭君和亲匈奴之后。《汉书·匈奴列传赞》称 “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① 《汉书·元帝纪》所谓 “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② 宋末元初陈普《王昭君五首》其三云 “出嫁毡裘得几时，昭阳柘馆贮歌儿。蛾眉莫怨毛延寿，好怨陈汤斩郅支。”③ 历史之偶然，造成昭君命运之必然，诗人据史实述说，可作汉强胡弱形势之左证。

东晋石崇（249 – 300）所作《王明君辞并序》④ 称 “匈奴盛，请婚于汉”，是误读西汉史：以安抚羁縻为妥协忍让。盖武帝至元帝时主动积极之和亲政策，不同于西汉初年之匈奴强大，威逼王朝，⑤ 石崇错置时空，联想模拟，后世咏昭君多受其影响。如宋姚宽《昭君曲》称 “自嗟薄命无归路，弱质安能事强主？”⑥ 郑清之《偶记赋王昭君漫录之》亦云 ‘解携尤物柔强虏，延寿当年合议功。”⑦ 所谓强虏、强主云云，大多误读西汉历史，错以安抚羁縻为妥协忍让，且类推以为汉弱胡强，于是昭君必须和亲匈奴，下嫁番邦，⑧ “以弱质事强虏”。

《汉宫秋》传承此种误读，而有单于求婚于汉，汉遂不得不遣公主和番之情节。呼韩邪单于上场诗称 “控弦百万”、 ‘款塞称藩”，盛气凌人，颇见强势。以下历数春秋以来，匈奴先王之丰功伟绩，凸显围高帝白登，娄敬献策，公主和亲，惠帝以来，必循故事云云。所叙历史，八、九分真实，一、二分虚假。文中三言兵马壮，威逼汉朝，所谓控弦百万、控弦甲士百万、甲士十万云云，在在暗示其强盛。《汉宫秋》第三折，王昭君亦云 “今（番王）拥兵来索，待不去，又怕江山有失；没奈何将妾身出塞和番”，委屈求全，以国家安危为重，亦暗示胡强而汉弱。其实，这是汉武帝以前匈奴盛况，今移花接木，以指称汉元帝时，未免误读。揆诸史实，大谬不然。据《汉书·匈奴传》：郅支单于为康居所诛后，呼韩邪单于 “且喜且惧”，上书言 “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入朝，单于自言 “愿壻汉室以自亲”，于是元帝 “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⑨ 何有控甲百万，威逼汉室，要挟婚配之事？可见杜撰历史，只为因文造情，方便敷衍故事而已。《汉书》、《后汉书》并无画工造伪事，《西京杂记》始有画工弃市情节，亦不指斥毛延寿。唐人演述昭君故事，多牵合为一，本已荒诞无稽，然不失附会之巧妙。《汉宫秋》杂剧，为设计冲突情节，再次改造毛延寿，从画工变为朝中大夫、选秀特使。毛延寿选秀时，索贿不成，乃携美人图叛逃匈奴，怂恿单于 “按图索要”。于是番王 “求索王昭君”，作势 “引控甲士，不日南侵”；于是方有元帝之百般无奈，不得已 “教娘娘和番”。元帝与昭君爱情之聚散匆匆，离恨悠悠，亦都由此生发。

《汉宫秋》叙毛延寿携美人图入匈奴，怂恿单于按图索要昭君事，马致远或许脱化自陈平以 “好丽美女”往说单于阏氏，事异而理同，盖从此生发而出。案《史记·陈丞相世家》载：陈平奇计解高祖白登之围，“其计秘，世莫得闻”。东汉桓谭《新论》推测：匈奴困汉高帝于白登七日，“陈平必言汉有好丽美女，为道其容貌天下无有，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与单于”云云，所

---

① 班 固《汉书》，颜师古注，卷 94 下，第 3832 – 3833 页。

② 《汉书》，卷 9，第 297 页。

③ 陈 普《王昭君五首》其三，《全宋诗》卷 3650，第 43808 页。

④ 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晋诗》卷 4，台北：世界书局 1978 年版，第 401 – 402 页。

⑤ 参考张长明《试论西汉的汉匈关系及和亲政策》，《江淮论坛》1983 年第 6 期，第 86 – 88 页。

⑥ 姚 宽《昭君曲》，《全宋诗》卷 1969，第 22061 页。

⑦ 郑清之《偶记赋王昭君漫录之》，《全宋诗》卷 2898，第 34621 页。

⑧ 唯宋人亦有知其误读，于诗中稍加匡谬者，如舒邦佐《咏昭君》：“今日呼韩朝渭上，如何万里嫁昭君？”于石《读明妃引》：“马上琵琶徒自恨，不思强汉弱匈奴？”分见《全宋诗》卷 2552，第 29586 页；卷 3677，第 44154。

⑨ 班 固《汉书》，卷 94 下，第 3803 – 3808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游说者虽有阏氏、单于之不同，而挟“好丽美女”以成其事则同。反客为主，道通为一，此文学作品转化创新之道。求异思维（divergent thinking），又称发散思维，指思考路数不受既有经验或规则之限制，往往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式，去寻求问题之解决，变通性、独创性、探索性为其主要特征。① 由此观之，马致远《汉宫秋》曲文在故事情节安排，人物形象设计方面，暗合创造性思维中之求异思维。故所作多不落俗套、独辟溪径、标新立异、人所未有；而且多方求索，不盲从传统；思路宽阔，求变追新，堪称创造多于模仿。②

（五）琵琶错位：塞外秋声变为汉宫春怨

东晋石崇刻意联想、模拟，误读历史、假借琵琶，张冠李戴，且以之开始打造昭君幽怨之形象。王昭君和亲故事，以琵琶传写哀怨，抒发不幸遭遇，此为创始。

《琴操》、《西京杂记》，乃至《汉书》、《后汉书》，均未载记王昭君能弹琵琶事。言昭君弹奏琵琶，大抵起于东晋石崇《王明君辞并序》，所谓“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据傅玄《琵琶赋序》，公主刘细君嫁乌孙时，弹琵琶者“乃从行之人，非行者（细君）自弹也”。由此可见，昭君弹奏琵琶，经过二次切换始成。石崇发挥联想、模拟思维，进行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切换，将原本属于乌孙公主和亲的琵琶，移转给王昭君和亲弹唱，于是公主琵琶转化为昭君琵琶，开启后世叙写昭君出塞，以琵琶传达怨恨之先声。

琵琶旋律之掩抑凄清、幽怨依依，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足以愁塞月、恨边云、敛人眉，故唐宋诗人咏昭君出塞和亲之不幸，多藉琵琶代言心声。唐宋诗人咏写琵琶代传昭君哀怨，每与出塞泪、异域恨、身后名等结合，不过为诸事的触媒而已。如杜甫《咏怀古迹》：“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李商隐《王昭君》：“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继志述事，则有宋人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二：“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愁坐泠泠调四弦，曲终掩面向胡天”；秦观《王昭君》：“独抱琵琶恨更深，汉宫不见空回顾”；王洋《明妃曲》：“故乡阡陌想依然，马上琵琶向谁语”；黄裳《昭君行》：“随无鸳鸯欢悦情，送有琵琶哀怨声”；刘次庄《王昭君》：“敛袂出明光，琵琶道路长”。诸家诗篇，皆以琵琶传写昭君之哀怨。场景多在塞外，以琵琶之苦调多，悲飒飒，容易引发“关山思，秋月寒”之效应故也。③

马致远《汉宫秋》中之琵琶春怨，异乎唐宋诗中之塞外秋声，却是汉宫掖庭之孤闷音响。王昭君自白：“在家颇通丝竹，弹得几曲琵琶”，看来这琵琶只是王昭君家居习得之音乐素养，不是出塞“作胡语”、“分明怨恨”之音声。较近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所称“学得琵琶”的汉宫女手，根本“不识黄云出塞路”的遗恨和断肠。王昭君上场诗有所谓“良宵寂寂谁来伴，惟有琵琶引兴长”；易言之，昭君在未遇元帝时，琵琶只是消遣孤闷的良伴而已。如此安排，无异时空大挪移：时间从出塞倒回入宫，空间从塞外变为宫廷。琵琶为传写情意之媒介，犹司马相如之琴挑卓文君，容易藉音乐拉近彼此心灵之距离。于王昭君，不过藉琵琶消遣孤闷，弹者无心，不意元帝听者有意。《汉宫秋》第一折，《混江龙》书写琵琶旋律，诉说着“良宵寂寂”的“孤闷”，曲传出“斗牛星畔盼浮槎”的望幸，寄寓着“望昭阳一步一天涯”的怨望，所谓“曲曲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这种孤闷怨望，正藉琵琶声“写出嗟呀”，也亏汉元帝能听出弦外之音。于是传旨接驾，琵琶弹奏成为这对露水鸳鸯的触媒和转化器。要之，与塞外琵琶之饱含秋声边愁不同。此一昭君琵琶之孤闷，毕竟与公主和亲琵琶之哀怨有别。

---

① 张永声主编《思维方法大全》，第49－50页。

② 莫砺锋编《程千帆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卷，程千帆《文论十笺》，下辑《模拟＜论模拟与创造＞》：“以今作与古作，或己作与他作相较，而第其心貌之离合。合多离少，则为模拟；合少离多，则为创造。”第227页。

③ 张高评《创意造语与宋诗特色》，第422－435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马致远《汉宫秋》之后，有关昭君故事流传中之琵琶，分化为两个意象：一为汉宫望幸之孤闷琵琶，一为塞外和亲之哀怨琵琶。戏曲小说或兼采并用，古典诗中，则多藉琵琶传写怨恨悲愁。如清人题咏昭君约400余首，其中近30首叙写昭君出塞时，藉琵琶传达心声：或曲传哀怨、幽怨，或代言怨恨、哀愁，或兴寄忧愤苦辛；更有化悲哀怨叹为乐观旷达者，则为琵琶之变奏。① 要之，唐宋及满清诗人题咏，于“琵琶哀怨”意象之趋同反应，相形之下，更加彰显马致远《汉宫秋》中琵琶之触媒作用，更加凸出望穿昭阳的宫女弹奏“孤闷琵琶”的意义。由哀怨转化为孤闷，意象之经营极具创新之价值。所谓“不开前未有，焉传后无穷”，马致远《汉宫秋》足以当之。

（六）美人贞节：和亲英雄转为殉节娘娘

晋石崇《王明君辞》有云：“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论者称“杀身良不易”二句，埋伏后世民间文学安排昭君守节而死的端倪。② 无论石崇之未易杀身，或《琴操》之吞药而死，或《王昭君变文》之得病以殁，都与《汉书》、《后汉书》生子再嫁有别；皆可作为《汉宫秋》将王昭君塑造为殉节娘娘之张本。

出塞和亲，绥靖边尘，本是昭君故事流传之主旋律。除《琴操》不愿再嫁为阏氏，“乃吞药自杀”外，唐宋诗人题咏，王昭君形象多是有功两国和平之女英雄，委屈求全之和亲特使。就《全宋诗》题咏昭君而言，十分推崇和亲匈奴之福泽，所谓“蛾眉却解安邦国，羞杀麒麟阁上人”。譬如释智圆《昭君辞》：“静得胡尘唯妾身，汉家文武合羞死”；刘次庄《王昭君》：“蛾眉如有用，惭媿羽林郎”；华岳《阅明妃传》：“一万边兵不立功，却令娄敬自和戎”；叶茵《昭君怨》：“将军歌舞升平日，却调琵琶寄怨声”；赵希逢《和阅明妃传》：“安边良将不收功，公主如何嫁犬戎”；宋无《昭君曲》：“单于世世求和亲，汉塞自此无风尘”；王元节《青冢》：“汉家多少征西将，泉下相逢也合羞”。③ 要而言之，王昭君“绥靖边尘，峨眉有用”；失意虽可恨，和戎却不朽。

历史记载：自汉宣帝以来，昭君和亲匈奴之效益，十分显著：从此胡汉边境“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④ 王昭君之红颜胜人，和戎靖边，带来汉胡两国艾安，福泽广被。影响所及，宋人之题咏昭君，由于宋辽“澶渊之盟”，⑤ 宋金绍兴和议、⑥ 隆兴和议、⑦ 嘉定和议三大和议之制约，⑧ 往往推崇褒赞有加。如王洋《明妃曲》：“山西健将如君否，此日安危托妇人”；李纲《明妃曲》：“当时失意虽可恨，犹得千古诗人夸”；刘子翚《明妃出塞图》：“西京自有麒麟阁，画向功臣卫霍间”；周必大《读汉元帝纪》：“一时抱微恨，千古留剩馥”；许棐《明妃》：“汉宫眉斧息边尘，功压貔貅百万人”；郑清之《偶记赋王昭君漫录之》：“青冢不遗芳草恨，白沟那得战尘空”等

① 张高评《清人题咏昭君与琵琶写怨——王昭君形象之流变与定调》，高雄师大《国文学报》第14期（2011.6）。

② 曾永义《俗文学概论》，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版，第499页。

③ 上述文献，俱见《全宋诗》所录，分别收载于卷137，第1538页；卷978，第11325页；卷2887，第34432页；卷3188，第38244页；卷3266，第38945页；卷3723，第44767页。薛瑞兆、郭明志编纂《全金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卷37，第482页。

④ 班　固《汉书》卷94，第3826页。范　晔《后汉书》，李贤注，卷89，第1062页。

⑤ 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卷58，真宗景德元年“辛丑，录契丹誓书”条，附载《两朝誓书册．景德元年誓书本》，第1299页。

⑥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参考陈振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35页。

⑦ 脱　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30页。参考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391－411页。

⑧ 陈振主编《中国通史》，《开禧北伐与嘉定和议》，第351－54页。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355、423－425、461－465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等皆是。[①] 由此观之，宋代诗人眼中，王昭君无愧是和亲的巾帼英雄，御戎的万里长城。文学形象如此，事实真相亦然。

班固《汉书·匈奴传》载：昭君奉命和亲匈奴，“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迨呼韩邪死，雕陶末皋立，“复妻王昭君，生二女。”对于昭君再嫁，乃依顺胡俗，两次为阏氏（单于皇后），生有一子二女，十分不合汉俗“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之贞节观念。易言之，若衡以通俗文学美女形象之修辞策略，夫死再嫁，确实不合美女英雄“贞节化”之标准要求。[②] 因此，《琴操》率先改易昭君之结局，安排昭君坚从汉俗，不依胡俗，宁可“吞药自杀”，也不愿再嫁为胡妇，[③] 成就了美女英雄之贞节，为《汉宫秋》杂剧“不肯入番，投江而死”之蓝本。其后，《王昭君变文》尤而效之，叙写昭君到匈奴，因思乡念国，不久病死，亦未有再嫁失贞之情事。要之，都切合中原汉民族之贞节观。历史上的王昭君，确实是一位和亲的英雄。然而和亲再嫁，胡俗与汉俗不同，于是通俗文学如《琴操》、《王昭君变文》、《汉宫秋》或以为名节有亏，于是昭君和亲变奏为昭君殉国，和亲英雄转变为殉节娘娘。

元杂剧虽为诗剧，乃是通俗文学之作品。论者以为俗文学之女英雄形象，修辞策略大抵依循美化、雄化、贞节化之标准。[④] 宋诗中之王昭君，红颜胜人，具备美化；和戎有功，具备英雄化；唯不提再嫁生子事，是有意回避贞节议题，暗合《春秋》书法所谓“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之曲笔表述。[⑤] 于是《汉宫秋》中之王昭君，具备美化、贞节化之条件，而不及英雄化。《汉宫秋》第三折剧情安排，写昭君随单于行至“番汉交界”的“黑江”边，“不肯入番，投江而死”。看似突兀，其实第二折已埋下舍身殉国之伏笔：当文臣武将怯懦，力劝娘娘和亲时，昭君曾言：“妾既蒙陛下厚恩，当效一死，以报陛下。妾情愿和番，以息刀兵”；临辞大会又称：“妾身这一去，虽为国家大计”云云，草蛇灰线，已隐见为国殉节之决心。清代尤侗撰《弔琵琶》杂剧，亦安排王昭君投黑水河而死。论者以为，二杂剧之处理昭君故事如此，“可见作者染上非常深厚的儒教思想”，[⑥] 理或然也。与《琴操》所谓“心有怨旷”，《后汉书》所谓“积悲怨”，乃负气和亲匈奴，大有不同。自是有所为而为，故《汉宫秋》曲终奏雅，题目书之云：“沉黑江明妃青冢恨”，情节安排堪称顺理而成章。

三、结语

自唐韩愈作文，主张陈言务去，词必己出。[⑦] 历代文论家多因之：清代袁枚论为文之道，以为作家对于老生常谈，“必如谢绝泛交，尽行麾去，然后心精独运，自出新裁。”[⑧] 方东树《昭昧詹言》论创意与造言，说法亦相通，惟较侧重陈言之务去，主张回避“凡俗、浅近、习熟、迂腐、常谈，凡人意中所言”，以及“常人笔下皆同者”；进而“别造一番言语”；总之，“大约刻意求与古人远”。[⑨] 持此以论马致远《汉宫秋》之创作，诚

---

① 上述文献，俱见《全宋诗》所录，王洋诗，卷 1687，第 19837 页；李纲诗，卷 1550，第 17609 页；周必大诗，卷 2322，第 26717 页；许棐诗，卷 3089，第 36841 页；郑清之诗，卷 2898，第 34621 页。至于刘子翚《明妃出塞图》，《全宋诗》漏收。别见陈邦彦选编，清康熙御定《历代题画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14 页。

② 洪淑苓《交换女人——昭君故事的叙事、修辞与性别政治》，《国文学报》2003 年第 34 期，第 182－188 页。

③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 11，蔡邕《琴操》，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15 页。

④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和性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6－90 页。

⑤ 《春秋谷梁传》成公九年称《春秋》有三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王熙元《谷梁范注发微》，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研究论文第 270 种，1972 年版，第 609－618 页。杨树达《春秋大义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6－275 页。

⑥ 陈鹏翔《主题学理论与实践：抽象与想象力的衍化》，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 2001 年版，第 277 页。

⑦ 韩愈撰，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55、2641 页。

⑧ 袁枚《随园诗话》，卷 7，台北：汉京文化公司 1984 年版，第 244 页。

⑨ 方东树撰，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卷 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16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能“别造一番言语”、“求与古人远”；堪称“心精独运，自出心裁”之杰作。

王昭君和亲之故事，自《汉书》以下，已发展成五个系统基型，各个文本之空白处、否定处、未定处，存在许多遗妍，值得后人开发。六朝、唐宋诗人题咏昭君，作品在240首以上，对于昭君故事之附会、孳乳，昭君形象之补充塑造，又贡献良多。元代马致远撰《汉宫秋》，面对东汉到两宋丰富之文化遗产，无论何人之名篇佳作，就文学艺术追求创意与造语而言，耳熟能详之言，多已流于凡近无奇，老生常谈。[①] 杂剧之为表演艺术，命意与措词每追求创意与新奇。文学语言追求之变异与陌生化，独到与创发性，[②] 号称元人杂剧压卷之作的《汉宫秋》，多有具体而微之表现。

《汉宫秋》之艺术成就，表现在变异与创新方面，最值得赞赏。《汉宫秋》之本事，若与《汉书》、《琴操》、《西京杂记》、《后汉书》、《世说新语》相比较，再与六朝、唐、宋诗文作对勘，表现许多转化、变异，有陌生化之美感；其中更存在若干自得自到，创造发明。文学作品有因有革、有拟有改、有述有作，有模仿更有创造，于是变异与创新，正是文学语言追求的目标，更是古今中外一切文学与艺术尽心致力之创作理想。本文探讨《汉宫秋》本事之变异与创新，以唐宋诗为对照组，参考昭君故事之五大系统基型，提出六个面向：叙事之视点，由聚焦王昭君转变为特写汉元帝；空间之场景，自塞外穹庐挪移为汉宫掖庭；汉胡之形势，由汉强胡弱转为汉弱胡强；琵琶之代言，从传写怨恨变为排遣孤闷；史传之元帝诚信不欺，杂剧之君王风流多情。史传诗文之王昭君，出塞和亲；马致远之《汉宫秋》，投江殉节。这些变异与创新，大多暗合创造性思维之变通性、开放性与独创性。

马致远《汉宫秋》杂剧之变异与创新，信能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重人之所轻，轻人之所重；且又异人之所同，忽人之所谨，确实符合“成一家之言”之标准，同时达到文学语言之主体要求。戏剧家以艺术手段来铸造观众审美感知的变异，有着各种目的。日本吉川幸次郎以为：马致远《汉宫秋》，正是透过天子这种特殊人物的困境与悲哀，写出人间普遍存在，而难以释怀的爱情本质。戏剧学者余秋雨《观众心理学》称：剧作家希望通过变异，“给观众带来一些陌生感和阻隔感，使他们兀然惊起，获得在平时熟识无睹的人生要旨”，从观众感知而言，《汉宫秋》确实具有这些魅力和效应。也许，这就是它流传不朽之主因。

[责任编辑] 黎国韬

① 马致远应该娴熟唐宋诗，且看《汉宫秋》第三折，王昭君云“自古道‘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所引诗文，为宋欧阳修《再和明妃曲》七言古诗最后两句。

② 鲁枢元《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52页。孙逊、孙菊园《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269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Main Abstracts

Some Reflections on National Cultural Ecology Reserve Construction

Song Junhua 1

The national cultural ecology reserve construction is a new ac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ecological attribute of culture, the system of cultural ecology, and the dynamic and regional aspects of cultural ecology system are bases of understand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ecology reserve construction. Natural reserve construction and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especi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y museum provide national cultural ecology reserve construction with fruitful practical experience. National cultural ecology reserve construction has just started and encountered complicated problems, such as problems of declaration and protection subject, of classification and range, of regulations and mechanisms and of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etc. To know the nature of these questions can help find effective solu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Plots of *Han Koong Tsew, or the Sorrows of Han, A Chinese Tragedy* 《汉宫秋》

——The Evolution from Poetry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o Zaju of Yuan Dynasty

Zhang Gaoping 20

Compared to poetry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plots of *Han Koong Tsew, or the Sorrows of Han, A Chinese Tragedy*, are reflected in five systems. They are a transformation of narrative focus from Wang Zhaojun to Han Emperor; a spatial change from yurts out of Great Wall to maid residences of Han Palace; the situation between Han people and Hu people changes—Han people is getting inferior to Hu people; a usage change of lute from expressing resentment to distracting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honest Emperor Yuan of integrity i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romantic emperors in Yuan Zaju. It is because of thes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that *Han Koong Tsew, or the Sorrows of Han, A Chinese Tragedy* could spread immortally.

Yang Lian Legend's Glamour and Value

Liu Shouhua 74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program, folk legend, as an oral literature, has gained broad attention. With an object of a folk legend which is newly discovered in Hubei province and which tells that Yang Lian, a censor of Ming Dynasty, indomitably struggled with Wei Zhongxian from Yan Dang which is one of political factions of M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nar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legend, and proposes it is imperative to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